

论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协调发展观

王 泽 兵

(四川师范大学 招生就业处, 四川 成都 610068)

摘要:要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协调发展理论为指导,坚持科学的协调发展观。坚持科学的协调发展观实质上包括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经济和谐发展、社会和谐发展三个方面,三者层层递进、彼此协调。

关键词:构建;和谐社会;协调发展观

中图分类号:D6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5)05-0010-06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多次出现“和谐”一词,特别是在谈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时,强调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使“社会更加和谐”[1]。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2]。在十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再次明确指出要“着力建设和谐社会,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3]。这表明,构建和谐社会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的又一更高目标。本文将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出发,分析协调发展观的理论基础以及如何正确理解和运用协调发展观。

述,和谐社会就是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社会。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和谐社会就是经济和社会、城市和乡村、东中西部不同区域、人和自然、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关系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的社会。但从现实看,我国目前还有诸多与和谐社会要求存在差距的方面,这集中反映在人与自然、经济、社会三个方面。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传统发展观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单向性索取,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非协调性。综观世界工业化进程及我国赶超战略实施的过程,工业化所取得的巨大成果总是以伴随着大气、土地、河流与海洋的污染,生物种类的灭绝,废物的排放等所导致的居民生活环境质量下降为代价。从我国的现状来看,全国水资源短缺和污染情况都相当严重,水资源总量为 27460.2 亿立方米,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 2131 立方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1/4,而废水排放总量为 459 亿吨,全国七大水系中有 80% 流经城市的河段被污染[4](421 页)。随着城市化建设与经济发展、人口数量的增加,水资源严重不足的问题还会更加尖锐。水是人类起源与生存的先天条件,先天条件遭到严重破坏,必定对后天发展形成巨大的障碍,所以必须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来

从理论上讲,和谐社会就是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用社会学术语来表

收稿日期:2005-02-18

作者简介:王泽兵(1971—),男,四川南充人,四川师范大学招生就业处副处长,法学硕士。

支持人类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国环境污染问题也十分突出,据统计,全国每年排放二氧化硫 2159 万吨,烟尘排放量 1048 万吨,全国每年产生工业固体废物 10 亿吨,其中危险废物 1000 多万吨[4](422 页),全国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二级标准的城市仅占 1/3[4](429 页),而且由于湿地、森林的面积逐年减少,致使对空气的净化和调节功能减弱,严重影响了我国城市的空气质量和生态环境。环境的恶化直接导致了人类自身健康标准的降低,超前掠夺的开发观念与淡薄环保意识所导致的自然条件的恶化直接损害了人类生存环境。尽管我国经济确实在以很快的速度增长,但这种增长速度由于与环境条件无法协调而背离了和谐的原则,1998 年我国长江中下游、松花江、嫩江的洪涝灾害,就是其中最明显的例证。其实,恩格斯早在 150 多年前就告诫人们:“不要过分陶醉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5](383 页)

传统发展观在经济结构上,强调非均衡的发展,过分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造成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日益拉大,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在发展的内涵上,传统发展观偏重经济指标的增长,忽视其他方面的发展,造成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非协调性。如近年来我国 GDP 持续高速增长,工业化水平已达到中期阶段,但城市化仍处在较低的水平,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我国人均 GDP 已突破 1000 美元[4](53 页),按照国际标准已进入小康阶段,但是按世界银行的标准(人均 785—3125 美元为下中等收入国家),只相当下中等收入国家的下限。全国仍有 10.95% 的成人是文盲或半文盲[4](109 页),还有 2600 万人生活在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4](891 页)。我国现在建设的还是一个偏重物质消费型的小康社会,大量考虑的是基本物质生活的改善,精神生活、政治生活、人口素质考虑较少,还远未达到经济、文化、政治、生态的全面而和谐的发展,远不是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小康。

传统发展观在社会发展方面,片面倚重通过资源配置来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而忽视通过收入分配的改善以提高社会公平和社会公正,造成公平与效率的不协调和社会经济的不平衡。首先是地区发展的不平衡。西部 12 个省市自治区,面积占全国的

71.5%,而国内生产总值却只占全国的 16.9%;2003 年我国东部地区人均 GDP 已经达到 1400 美元,而西部地区却不足 800 美元[4](39 页)。其次,这种不平衡还表现在城乡的二元结构和高低收入人群之间。2003 年,全社会总劳动力中的 59.5% 从事农业生产,但仅创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 14.6% [4](32 页),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差距达到 3.2 倍以上,西部 12 个省市自治区人均收入差距达到 3.6 倍以上[4](40 页),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达到 3.6 倍[4](70 页),恩格尔系数城镇为 37.1,农村高达 45.6[4](357 页)。再次,我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还不够协调、平衡,主要表现为公共卫生事业发展滞后、公共卫生体系存在缺陷、突发应急机制不健全、处理和危机管理能力不强、农村社会保障缺乏等。

以上事实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协调发展,应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发展,应更突出人的价值,体现全面、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有机结合的思想,突出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城乡协调、阶层协调、人与自然协调。从 GDP 到 HDI 的演变,在经济伦理学背景下的新发展观,既不是传统的以掠夺自然、征服自然为特点的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也不是将人类的利益完全等价于自然界草木禽兽的非人类中心主义、极端自然主义。忽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忽视人民群众的自身素质教育,忽视资源环境保护,忽视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从长远角度讲必将导致整个经济社会付出沉重的代价。所以,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中,实现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伟大目标,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与政治文明的协调发展,坚持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在开发利用自然中实现人和自然、社会的和谐,我们必须树立以人的全面发展与自然、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全新发展观念。

二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超越时代局限,提出了很多前瞻性的、对人类解决生态危机和其他社会发展问题极具启发和指导意义的一系列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性、一致性,强调人

与自然和谐一体,“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6](144页)。注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也是马克思社会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和指向之一。在《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已蕴含了丰富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思想。可以说,马克思始终把社会看成是一定经济形态的有机系统,认为社会发展应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构成的有机系统的全面协调的整体发展,是政治、经济、文化及人自身的全面发展,而非仅仅是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增长,或是社会某一要素的片面发展。所以,马克思强调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强调物质资料的生产、经济因素对整个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决定性作用,但他从未忽视过社会其他非经济因素的发展,更不是经济唯一论。在马克思看来,“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相互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5](506页)。同时,经济因素自身的发展不能脱离社会结构的整体发展,而是要受到政治条件、历史文化传统乃至自然地理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为社会本身“就是一切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7](144页)。因此,马克思既看到了经济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又看到了社会其他因素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和制约;既认识到经济增长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又认识到社会发展是基于经济增长之上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系统发展,从而要求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以达到社会的全面进步。

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毛泽东思想,也表现出一定的协调发展思想。1956年4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关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思想。上世纪50年代中期的中国,农业落后,工业也刚刚起步,如何处理好农业与工业中的轻工业与重工业之间的关系,是比较突出的问题。毛泽东辩证地分析了农、轻、重之间的相互关系,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

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8](268页)毛泽东明确提出了调整产业结构的科学思想:即在产业结构中,既要发展重工业,但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轻工业作为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业,又不能忽视,重、农、轻三者要有一个合理的比例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使各产业部门相互制约、相互促进,从而使国民经济的增长奠定在一个合理的结构基础上。关于地域经济结构是否合理的问题,毛泽东指出了要处理好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问题。他指出,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约70%在沿海,只有30%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状况。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可是,发展内地工业,需要资金、技术和人才,需要沿海发达地区支援,这就要处理好沿海与内地的关系。那么,如何处理沿海和内地的关系呢?毛泽东认为,一方面,必须大力发展内地工业,以改变沿海与内地这种不合理的状况;另一方面,由于沿海工业在设备、技术和人才等方面十分雄厚,必须充分利用这些优势,发展沿海工业,“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8](270页)。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毛泽东指出,“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8](271页)。关于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毛泽东认为,必须三者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8](272页)。所有这些都体现了毛泽东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思想。

邓小平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继承并发展了毛泽东关于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思想原则。基于对“社会有机体”的认识和对可持续发展观的深刻理解,邓小平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整体变迁的过程,一个社会全面进步的综合性概念,是应该包括经济增长在内的社会结构、人民生活、科技教育、社会秩序等各方面的综合进步。在他看来,任何社会要发展,首先要注重经济的发展,但又不止于此,还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致力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共同发展,亦即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因此,一方面,邓小平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指出“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是摆脱落后”[9](244

页),认为经济增长是社会全面持续发展的前提、基础,并由此确立了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要求通过经济发展来解决中国的政治、人口、资源和环境等一切问题。另一方面,邓小平又强调坚持经济增长与社会全面发展相协调。邓小平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内容包括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三个方面,三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缺一不可。“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任务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不能单打一”,“需要综合平衡”[10](249—250页)。此外,邓小平的发展观中关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思想,还突出体现在他所提出的一系列“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辩证统一观点中。如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经济犯罪;一面抓经济建设,一面注意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环境保护等等。可见,邓小平确立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要求的经济发展效益与社会发展协调并进。不仅如此,邓小平还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应该而且完全可以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他说:“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9](143页)在他看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共同进步,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江泽民也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11](382页),并多次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什么时候都必须做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既促进经济的发展又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11](379页),“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各项事业,是相互协调和全面发展的事业,不但经济要上去,人民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素质和社会秩序、社会风气都要搞好”[12],“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使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11](282页),并将自然、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纳入中国现代化战略的总体考虑中。在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再次强调,我们应该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深入,精神文明建设要切实加强,各个方面相互配合,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1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体现的发展观更将是协调发展观蕴含其中,既是对马克思社会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对邓小平发展观的深化和创新。在这里,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发展,还包括政治、文化和人的全面发展等多方面的内容;发展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政治文化相协调的发展,是以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为整体目标的发展;发展是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之路,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可持续发展,同时还是谋求人的全面发展和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的过程。而如何保证我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是十六届三中全会的重要议题之一。全会强调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统筹经济社会发展,这是对新世纪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为加快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作出的一个重要战略部署[14]。可见,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党已突破了单纯以经济增长为衡量发展水平的唯一指标的片面发展观,而始终把社会发展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把握,既强调以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带动社会的全面发展,又要求以社会的综合进步促进经济的增长,达到二者的协调并进。

三

协调发展是指社会各子系统之间出现良性互动、能量互补关系,社会某一子系统的发展不以牺牲其他子系统发展能力为代价的发展。它强调发展的整体性和综合性,要求将社会当作复杂有机体看待,注重各阶段之间发展的协调性,这种发展观念符合现代系统科学理论。协调发展观事实上包括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三个方面,三者层层递进,彼此协调。

地球上生命的进化过程需要一定的自然环境,包括来自太阳的持续的能量流、大气圈、水圈、表土圈和岩石圈。在自然环境的基础上进化出了生物圈,又叫生物生态系统,它包括植物、动物和微生物三元结构。植物是生产者,动物是消费者,微生物是分解者,它们相互耦合,形成生产、消费和分解三个环节构成的无废弃物的物质循环。因此,良好的生物生态系统可以长期维持并持续进化。但随着人口的增长,土地大量开垦,森林毁坏,以及大量开采与使用矿物资源等,破坏了人类自身赖以生存和进化

的自然环境和生物生态系统,并且随人口生产和消费增长加快,自毁根基的破坏越严重,这种恶性循环迟早会使人类文明的可持续进化成为问题,或者变成不可能。所以,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必须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既要加快发展的速度,更要注重增长的质量,努力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与效益的统一。要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实现协调发展要求把生产和消费造成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等社会费用内部化,推行生态经济的运行模式,真正使经济建设和生态建设有机结合、协调发展。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选择资源节约型、质量效益型的发展方式。生态环境的优化又将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丰厚的生态资源和环境资源。我们讲环境生态保护,并不是原始意义上的回归自然,更不是摒弃经济发展,而是要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更好的外部自然环境。协调发展观摒弃以前那种把单纯的经济增长观作为社会发展的全部的传统发展观,使经济增长体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实现有公平的效率和有效率的公平。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主要任务之一是统筹区域发展,即解决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协调发展的问题。统筹区域发展事关全国发展的大局。新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要实现双重要求:一方面,要有利于经济发达地区继续发挥优势,保持快速发展的势头,这是今后较长时期国家经济实力增长的主要依托,也是国家支持中西

部地区发展的财力物力支撑;另一方面,也要有利于经济落后地区加快发展,包括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快改革开放、实施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战略。

协调发展对一个国家人文、社会发展条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超越早期发展阶段的功利主义、物质主义的倾向。不仅如此,实现协调发展还需要对现有的生产方式进行变革,即从过去忽视社会环境、生态保护,甚至破坏生态环境的生产方式转变到关注、重视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社会生产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生产方式上来,并从生产方式、社会机制、法律制度上来保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现代社会的协调发展不允许后发展国家再采取野蛮的原始积累方式推动经济发展,不能再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老路——先污染后治理,否则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将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全部耗尽;不允许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使人身及社会发展付出高昂的代价。协调发展要求从社会的整体结构和功能出发,寻求总体的最佳发展,实现社会的全面和协调进步。因此,要改变目前我国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不够协调的状况,必须加快推进社会领域的各项改革,大力推进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的改革和发展,采取有力措施减少失业和贫困人口,解决社会公正和反腐败等社会问题。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要相应地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建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为改革和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参考文献:

- [1]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02-11-18.
- [2]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N].人民日报,2004-09-20.
- [3]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2005年3月5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N].人民日报,2005-03-15.
- [4]中国统计年鉴2004[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
-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8]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 [9]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0]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11]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 [12]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1992-06-10.
- [13]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1997-09-22.
- [14]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N].人民日报,2003-10-15.

Coordinating Development View in Building Harmonious Society

WANG Ze-bing

(Admissions and Placement Offic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Abstract: To realize the goal of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alist society, we must take as the guidance Marxist coordinating development theory and uphold scientific coordinating development view, which in essence includes harmonious development between man and nature, harmoniou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harmonious social development. The three developments coordinate each other in gradual progress.

Key words: building; harmonious society; coordinating development view

[责任编辑:苏雪梅]

●文史札记

关于《淮南子集释》引《吕氏春秋》一条文献的校定

大 明

《淮南子·天文》有云：“物以三成，音以五立，三与五如八，故卵生者八窍。律之初生也，写凤之音，故音以八生。”范宁《集释》：“《吕氏春秋·五月纪》曰：‘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阴，取竹于嶰谿之谷，以生空窍厚钧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次日“含少”。次（淡按：“次日”或作“次日”。今从毕氏校刊《吕览》据《说苑》定作“曰”。）制十二简，以之阮隃之下，听凤皇之鸣，以别十二律。……’”此引有疏误，故略辩之。

范引《吕氏春秋》文，在《仲夏纪》之《古乐》篇，作“吹曰舍少”云云。《吕览》此段文，古来多有所引，如《说苑·修文》、《太平御览》卷565等。《晋书·律历志上》录“传曰”，亦《吕览》文。但因皆无“吹”字，故而无由考此字是否衍脱，或与“次”孰是孰非。但原作“吹曰舍少”，各本同，范氏引录，不当擅改。

又，后“次”字下范氏引“淡按”云云，当在“次日”下，而误在“次制十二简”处，甚为无义。至于毕沅校，则云：“旧本‘曰’作‘日’。《说苑》作‘曰’。又‘舍’作‘舍’。今‘曰’字已据改正。”毕氏又校云：“‘舍’字亦讹。注‘舍成舍矣’四字，亦不可晓。因有此注，‘舍’字姑仍之。考《晋志》及《御览》五百六十五并作‘舍’，少明。”然据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引刘复考证，“吹曰舍少”不误。由此可见范氏之引录，甚有疏也。